

古文选粹对译丛书

明代游记选粹

朱家驰译注



古文选粹对译丛书

明代游记选粹

朱家驰 译注

天津教育出版社

明代游记选粹

朱家驰 译注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 5印张 1插页 10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5309—0074—9/I·15

定价：0.96元

序

游记是我国古代著述中的一种重要体裁，至今仍然非常风行。历代以来，在我国的文化宝库中所积累的各种游记，真是车载斗量，难以估计，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宗宝贵而巨大的遗产。

我国现存的最早游记是晋代从战国魏王墓中发掘出来的先秦古书《穆天子传》，全书六卷，除了最后一卷与游记无关外，前五卷记载的是周穆王驾八骏西游的故事。尽管事属荒诞，但行程有月日可稽，而沿途的许多地名，至今尚可考证。这当然是一种虚构的故事，但它以游记形式表达，是游记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中外古今，以后都有用这种虚构幻想的故事写作游记的，例如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用虚构的故事，记述了一个渔夫游历了被后人称为“世外桃源”的经过。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描述了虚构的主人公格列佛游历小人国、大人国等离奇经过，也就是这类游记中的一种。

先秦以后，游记的数量和种类增加，除了那种内容虚构的游记仍然存在外，由旅游者按自己的旅游见闻写作的第一手游记和其他学者按他人旅游的记录或别的资料编写而成的

第二手游记纷纷出现。这中间，马第伯所写的《封禅仪记》即是很著名的第一手游记中的一篇。马第伯随侍汉光武帝封禅泰山，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正月二十八日从洛阳宫出发，二月九日抵鲁，十一日从奉高县登山，生动而详细地记载了泰山的风景。应劭的《地理风俗记》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第二手游记，他根据他人记载的资料加以整理归纳，写出了后汉一代全国各地的地理风俗概况。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他既根据自己旅游的经历写作第一手游记，也利用他人的旅游记载写作第二手游记，两种类型的游记出现在同一种专著或同一篇文章之中，这就是以后广泛流行的一种混合型的游记。以司马迁为例，他年轻时曾遍游全国各地，阅历丰富，他所撰写的《史记》之中，如《太史公自叙》和《货殖列传》等篇，其中都包含他的第一手游记在内。但他的游历足迹不出域外，因此，《史记》中对域外的一些描述，如《大宛列传》，就利用了他人旅游的记录，主要是张骞从那里带回的一些报导，也就是说，属于第二手游记的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游记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动乱，大批原来生活在北部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从事农业生活，而原来定居在中原这片干燥平坦的小麦杂粮区的汉族居民，则大批南迁，定居到湿润的江南稻作区去。广大集团的人群，经历了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异。由于这种剧烈的变异，许多人在逃难或行军的过程中跋涉了万水千山，许多人朝朝暮暮地思念他们的故土，许多人对完全陌生的地理环境惊异不止。这是一个产

生游记的时代。随着第一手游记的增加，就为第二手游记的撰写创造了条件，使这一时期的游记丰富多采。有描述各地山川风景的，如宋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晋罗含的《湘中山水记》，宋刘澄之的《永初山川古今记》和《司州山川古今记》等；有介绍各地草木方物的，如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三国吴沈莹的《临海水土物志》，三国吴万震的《江南异物志》，三国蜀譙周的《巴蜀异物志》等；有记载各地风土的，如晋周处的《风土记》，北齐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北魏陆恭之的《后魏地图风土记》等；也有因参加战争，随军行动，记沿途见闻的，如晋伏韬的《北征记》，宋郭缘生的《述征记》和《续述征记》，宋戴延之的《从刘武王西征记》（或作《西征记》或《从征记》）；还有专门记叙宫殿、寺观、名胜、古迹的，如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佚名的《洛阳宫舍记》和《晋故宫名》等。在这个时期中，域外游记，特别是域外的第一手游记，也因中外交通的频繁而纷纷出现。最著名的当然是晋法显的《佛国记》（或作《法显传》），此外如晋支僧载的《外国事》，晋刘欣期的《交州外域记》，三国吴康泰的《扶南传》，宋竺枝的《挾南记》，北魏宋云的《宋云行记》等。有的域外游记是用书信的形式写作的，《俞益期与康伯书》即是其例。俞是晋豫章人，远游扶南，以书致康伯，述南国风土甚详。这些书信，都是非常生动真实的第一手域外游记。

在这个时期的所有游记中，最出色的无疑是酈道元的《水经注》，这是我国古代游记中登峰造极的作品，是我国

历史游记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明末清初人张岱曾经中肯地评价古人在游记写作中的成就：“古人记山水，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酈道元的《水经注》在历来一切游记中的崇高地位，于此可见。按照游记的性质对《水经注》加以分析，这是一种第一手游记与第二手游记合璧的著作。酈道元对北部中国，足迹殆遍，因此，他的游记完全是他的目击记载，是十分生动翔实的。卷四《河水注》所描述的孟门瀑布（即今壶口瀑布）可以为例：

“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阨？……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由于当时国家分裂，他的足迹未达南方，因此，对于南方各地的记载，他完全依靠别人的游记和其他资料。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游记资料的丰富，也因为酈道元选择别人游记的审慎精确，因此，尽管是第二手游记，却仍然写得栩栩如生，令人神往。例如卷三十四《江水注》中描写长江三峡的一段文字，他利用了袁山松的目击记载《宜都山川记》。《水经注》的这段游记，不仅保存了《宜都山川记》这部亡佚书籍的吉光片羽，而且成为古今游记中描写长江三峡的一段千古奇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

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隋唐以后，由于国家一统，人文升盛，地方安谧，人民的社会活动增加，撰写游记的条件优越，因此，游记作品很多。前面为张岱所赞赏的柳宗元（宗元），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因政事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故得遍游当地山水，撰写了《始得西山宴游记》等八篇游记，合称《永州八记》。这八篇游记文字清新，刻划如画，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游记。

这里还应指出一点，早在唐代以前，文人学士用诗词歌赋等韵文的形式写作游记，已经相当普遍。例如魏晋人喜欢作赋，当时有不少赋，如晋左思的《魏都赋》、《蜀都赋》、《齐都赋》、《吴都赋》等，杨泉的《五湖赋》，郭璞的《江赋》，王彪之的《庐山赋》等等，都具有游记的性质。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诗多，诗人多；以诗述游的也多。诗人出游，看到奇山异水，触景生情，即景作诗，既描述了自然风光，又寄托了自己的情趣，所以一首好诗，往往能胜过长篇的文字。例如，著名诗人李白，他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因事流放夜郎（今贵州遵义一带）。途中遇赦，从白帝城乘舟过长江三峡返回江陵。以这一日的沿途所见，写下了一首

《朝发白帝城》的七言绝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这样二十八个字记载长江三峡的一日游程，真是高度的概括。而且生动逼真，趣味盎然。用这样的诗篇作游记，就比一般的游记更引人入胜，百读不厌。唐代以后，以诗述游就成为文人士的一种普遍风气，历宋、元、明、清以至今日，一直不衰，其中多有佳作，为我国的游记锦上添花。

此外，唐朝是个大国，国际间的交流甚多，包括使节、商人，僧侣以及战争中的俘虏遣送等，这些往来人等所撰写的域外游记，数量也很可观。特别著名的是《大唐西域记》，此书为高僧玄奘所述，由辨机所编，共十二卷。玄奘在天竺十七年，游历一百一十国，此书所述，多是他亲见，所以价值很高。另外一种杜环的《经行记》。杜环是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子，他于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在一次对大食（阿拉伯）的战争中被俘，曾经周历中亚和西亚各国，十一年后，才附商舶从海道返国。游记中有许多他在中亚和西亚的目击记载。

游记到了宋代有新的发展，当时，文人撰写游记的风气很盛，在唐宋八大家中，如苏轼、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就都写过不少游记。其中有不少章篇如苏轼的《石钟山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等，历来脍炙人口。南宋作家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骞鸾录》和《吴航录》等，也都名闻遐迩。此外，由于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游记，到了宋代已经积累了很大的数量，

因此,有些学者开始从事整理历代游记的工作。也就从这个时代起,整理历代游记的成果,包括名胜志和游记汇编一类的书籍开始出现。如祝穆的《方輿胜览》,王象之的《輿地纪胜》等,都是名胜志的代表。到了明末曹学佺编纂《大明輿地名胜志》(简称《名胜志》)一百余卷,就是集其大成。游记汇编也很普遍。明慎蒙的《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和何鏊的《古今天下名山胜概记》等均是其例。在这方面集其大成的则是清末王锡祺所编纂的《小方壶斋輿地丛钞》。他花了二十一年时间,把清代撰有游记的名人五百七十六人的著作共一千二百余种,编入全书十二帙共六十四卷之中,真是洋洋大观,熔清代游记于一炉,其中如姚鼐、方苞、袁枚、梅曾亮、龚自珍等,都是一代名流,他们的游记,当然是不同凡响的。

还必须指出,在这一时期中,有两位杰出的游记作家,他们以超人的才能和勤奋的写作,为我国的古代游记增加了无限光彩。其中之一是前面张岱所称赞的袁中郎。袁中郎,名宏道,毕生好游历,其所作游记近百篇,直率自然,感情丰富。后人从他的全集中录出全部游记,另成一编,名为《袁中郎游记》(中国图书馆出版部1935年出版)。另外一个人是出生较袁宏道晚十九年的徐霞客,他生有旅游癖,于二十二岁开始旅游考察,足迹遍南北,特别是对于今粤、桂、黔、滇各省的旅游考察,历尽艰苦而成绩卓著。他在旅程中按日记载其经历,后因战乱散失不少,但至今流传的仍达六十余万字,即《徐霞客游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袁中郎游记》与《徐霞客游记》，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第一手游记，是值得珍视的游记遗产。

这一时期中的游记的另一特色，是域外游记的数量空前增加，这和对外交通特别是海上交通的发达有密切关系。除了李志常的《长春真人两游记》是记载元初中亚的第一手陆上游记外，其余多是海上游记。如汪大渊的《夷志略》，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马欢的《瀛涯胜览》等均是。这中间，费信、巩珍、马欢三人均曾随郑和通使西洋，他们的游记不仅都是第一手的，而且记述详细，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上约略叙述我国历史上游记的发展概况，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已经为我们积累了数量巨大的各种游记文献，这不仅是我们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

我们的祖先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以他们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感情，优美的文笔所撰写的巨量游记，我们确实应加以很好的整理和利用，这些优美、生动的章篇，在我们的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上，都将产生难以估计的力量。

首先，游记对于我们的思想，既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陶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而游记正是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许多游记的作者，往往就是热爱自然、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学者。以《水经注》为例，酈道元出生之日，中国南北分裂，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但他却以他热爱祖国，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以

西汉王朝的版图作为他的写作范围，把他的爱国主义感情，倾注在他的著作之中。在当年那种南北分裂，人民离散，干戈扰攘的情况下，有这样一部描述祖国一统，歌颂和赞美祖国山川风景、历史文物的爱国主义著作，真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今天，我们诵读这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游记，溯昔抚今，同样会使我们对祖国河山产生无比的感情。《徐霞客游记》同样也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著作。徐霞客是热爱自然的学者，美国学者亨利·施瓦茨，在他于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徐霞客与他的早期旅行》一书中，把徐霞客的游记称为“自然之爱”。这是深得要领的。在徐霞客的心目中，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值得热爱的。所以他才以毕生精力，不顾艰危困难，追求他对祖国的自然之爱。我们阅读这样的著作，很自然地会和他引起共鸣，激发我们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此外，从许多古人的游记中，我们还可以受到不畏困难、艰苦奋斗等教育。例如在晋法显、唐玄奘等人的旅行中，都经过出生入死的搏斗。当他们经过戈壁沙漠之时，《佛国记》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大唐西域记》也说：“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但是他们都没有为这种困难所吓倒。徐霞客在他的游程中也是历尽艰苦，百折不挠的。他在湘江遇盗后，游伴负伤，而主仆二人被洗劫一空，身无长

物，但他绝无归意，以最大的毅力，克服万般困难，而终于获得成功。

总之，游记在道德和精神文明方面可以给予我们教育之处尚多，以上不过是略举其例而已。此外，游记还具有陶冶人们的性情的作用，给予人们以一种精神上的高尚享受。明代的著名鄙学家谭元春为他的评点本《水经注》作序说：“予之得于鄙注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空濛萧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前面已经钞录了该书关于孟门瀑布和长江三峡的两段，吟诵这两段文字，闭目凝神，真如身历其境，到达了孟门和三峡一样。这样的享受，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前面也已经指出，在我国古代的游记中，实际上包括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在内。我们吟诵一首唐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或者吟诵一首宋苏轼的《湖上初晴雨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的诗篇，的确使人回味无穷，宛如身在枫桥舟次，邀友小湖边，真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享受。

除了教育和陶冶以外，游记并且是一种知识的宝库，它给予人们以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我国古代有一句鼓励人们读书的话，叫做“开卷有益”。这话对于游记来说十分适合。即使象前面提到的那种先秦时代的虚构游记如《穆天子传》，在我们今天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上，仍可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以后历代的许多第一手或第二手游记，对我们在科

学知识上的贡献就可想而知。以《水经注》为例，对我们研究历史地理学、生态学、河流水文学、碑版学、民族学、文献目录学等等，都有很大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同样是一部充满了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的游记。其中特别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的研究，这是一部举世罕见的古代科学文献。正是因为我国古代的游记拥有丰富的各种知识，它涉及许多学科的内容，在我们今天的各种科学研究中，都有古为今用的价值。

前面已经提到，游记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古代的许多游记，不仅其本身是一种旅游文献，一种参考书，有时并且是一种旅游文物，人们购买它，保藏它，作为旅游时的参考，作为学术研究时的资料，作为浏览吟诵时的享受，作为一种值得纪念的文物。此外，它所记载的内容，可以作为导游者讲解的依据和谈助，提高导游的质量和游客的兴趣。对于一个地区的旅游业的布局，旅游路线的安排以及名胜古蹟的修葺复元，古人的游记，都是重要的依据。所以尽管是时隔千百年的古书，但我们如能妥善利用，至今仍能提供直接的经济效益。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于我国古代游记文献的发掘整理，是一件十分必需的事。可喜的是近年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了显著的成绩，不少著名的古代游记，包括《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各种游记选、以及域外游记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等，都在陆续地点校出版。这样的工作，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不仅是一种用以保

存我国古代文化的一般的古籍整理，同时也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措施，有裨于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在当今整理古代游记的工作中，本书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因为既然古代游记具有我前面所说的种种价值，而要在广大人民之间发挥它的这种价值，却又存在着古今语言差异的困难。因为从全国人民来说，熟悉古代汉语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如能把古代游记用现代汉语表达，而又不损害原意，虽然工作的难度很大，却是极有意义的。我早年曾经有过一种打算，希望能邀集几位古今汉语素养较好的同志，共同合作，用优美的现代汉语改写出一种供广大读者阅读的白话《水经注》。以后终因工作难度很大而搁置了这种打算。假使本书出版以后能够获得较好的反映，那么，我早年的这种打算今后还是有机会付诸实现的。正因为此，所以我很乐意在本书卷首拉杂地写上这许多东西，而且也衷心地希望本书的成功。

陈桥驿

一九八六年八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明代游记概述

我国的山水游记，作为散文的一个重要部分滥觞于魏晋，成熟于唐宋。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大量小品文作品的涌现，山水游记出现了一个新的兴盛而繁荣的局面。这同当时作家辈出，不同的风格流派纷然杂陈，各种文学思潮相互斗争与消长密不可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明代的山水游记文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明朝开国之初，草创未就，一些由元入明的作家如宋濂、刘基等，虽然主要致力于高文典册的写作，间或也写一些寓言、传记和游记文学作品。如宋濂的《游钟山记》、刘基的《活水源记》等，记事抒情，格调清新，文笔生动。另外象高启，以诗名世，游记不多，但“意精而深，辞达而畅”，比之宋、刘亦自成一家。

明代中叶以后，文学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兴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之于后，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给予歌功颂德、空洞无物的“台阁体”诗文以沉重打击，然而由于他们忽视了思想内容，专门追求对古代文学作品字句、形式的因袭模仿，遂走上了舍本逐末

的形式主义道路。正当拟古主义的诗文风靡文坛的时候，继茅坤、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之后，万历中以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起而与复古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三袁受学于李卓吾，在其“童心说”的影响下，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要求文学创作充分表现作家的个性，反对复古派给文学形式制定的种种清规戒律。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不仅“一扫王（世贞）李（攀龙）云雾”，瓦解了复古派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而且对文体的解放、散文题材的扩大以及清新活泼文风的形成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影响所及，一时清新流丽、直抒胸臆的山水小品如雨后天青，层出不穷，给当时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如本书选录袁宏道的《满井游记》、《虎丘记》和袁宗道的《西山五记》（选一）等，都是文笔秀逸、清新流丽的佳作。三袁之中，尤以袁宏道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应当指出，由于公安派思想和生活方面的局限，不少作品流于贫弱浮泛，超尘出世的思想掩盖了坚实深厚的生活内容，给后世文学带来了不良影响。

正当公安派声势大振之际，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异军突起。他们提倡的“性灵”说与反复古的文学主张同公安派基本相同，但又不满足于三袁作品的“浮浅”、“俚俗”，便企图以“幽深孤峭”之风加以补救，诗文多用怪字、险韵，令人费解，结果误入了冷僻苦涩的歧途。他们的散文包括山水游记成就一般不高，仅有少量作品，细加寻绎也别具一番情趣。本书选录谭元春的《三游乌龙潭记》，对潭水